

#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国际共生论的视角

杨庆龙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共生论在中国学界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一个新的生长点。运用国际共生论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国际体系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时代,以结盟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已逐渐失去其合理性,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大国之间的必然选择。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中美在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具有共生性。但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仍处于非共生状态,存在较多矛盾和冲突。双方尚未形成全面和足够紧密的共生关系。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传统大国关系的现实主义逻辑仍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成熟的共生型国际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国际体系进化过程。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中国不能做一个消极的等待者,而要做一个积极的“施动者”,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早日成为现实。

**【关键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国际共生论 进化

**【作者简介】** 杨庆龙,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中原工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1-0109-17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701007

---

\* 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的宝贵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2013年中美两国元首“庄园会晤”时,习近平主席对新型大国关系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做伙伴、不作对手,以对话合作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兼顾双方利益,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sup>①</sup>人类在战火与硝烟中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斗争与冲突似乎已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在中美这两个分属东西方文明的大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国际政治实践。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似乎都不足以提供合理的解释和理论指导。相反,这些理论大多认为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在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更是不可想象。显然,旧理论无法指导新实践,新的国际政治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为此,需要有理论超越与思维创新,跳出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束缚,另辟蹊径,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及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思路、新方案。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共生论在中国学界兴起。该理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哲学思维方式,如整体思维、关系思维,有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具有重大的理论潜力,在该理论视角下探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一、国际共生论的演进路径

人应该如何生存、如何与世间万物共处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因此,早在古代社会,人类就形成了朴素的共生思想。东西方古圣先贤们的学说以及宗教教义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共生思想。如孔子的“中和”思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家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sup>②</sup>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等。1879年德

---

<sup>①</sup> 《习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华网,2013年6月1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

<sup>②</sup> 邹富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及其当代思考》,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

国生物学家德贝里（Heinrich Anton deBary）首先提出“共生”这一概念，它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照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sup>①</sup>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随着共生理念不断发展，共生的概念和理念逐渐走进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并取得很大的发展。第一，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很多关于共生的研究成果。史莉洁认为，“共生”指人类社会互利共存的生存状态。共生理论主要包含以下要义：首先，“共生”是共生单元之间的良性循环与发展。“共生”不是一方消灭一方，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共生单元之间实现互补、双赢；“共生”并不否认差异，否认竞争，但它不同于对立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共生”各方的竞争是和谐、融合的良好竞争，其结果是双方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其次，弱势者往往更倾向于“共生”，而强势者则要求独享利益。若让强势者接受“共生”，就要使之具有整体视野和长远眼光，认识到只有共生才能更好地促进各方利益的实现。<sup>②</sup>袁年兴认为，共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哲学概念，它蕴涵着进化、共同、合作等理念。进化理念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促进、相互激发可以促使共生单元及共生系统进化创新；共同理念是指异质共存的共生单元彼此之间具有互主体性，双方相互依赖、自由共在，保持自我；合作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依存，在互惠、互补中激活双方，取得共同的发展和进化。<sup>③</sup>卢风认为，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使人的主体性过分张扬，人成了唯一的主体而非人的一切成了客体，从而导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峙。人类要走出生存的危机，必须培养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共生意识，抑制人的主体性。<sup>④</sup>

第二，社会学领域也较早开始了共生理论研究。复旦大学教授胡守钧把

---

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第71-74页。

<sup>①</sup> 夏立平:《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0页。

<sup>②</sup> 史莉洁:《走向“共生”——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存哲学》,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1页。

<sup>③</sup> 袁年兴:《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00-102页。

<sup>④</sup> 卢风:《共生理念与主客二分》,载《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1999年第4期,第1页。

共生理论运用到社会学领域，提出了“社会共生论”，认为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要生存必须与他人共生。人类社会的共生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具有客观实在性，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的共生关系有合理/积极的，也有不合理/消极的。人是有理性、有智慧的，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动选择去建构或者优化合理/积极的共生关系。<sup>①</sup>

第三，共生理论也逐渐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2012年，胡守钧又提出了“国际共生论”，认为国际体系是个共生系统，各个国际行为体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国际共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同时这一共生系统也在不断演化，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这一共生系统的演化机制。优化国内共生关系以及国际共生关系，使之和谐共生，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sup>②</sup>

胡守钧的“社会共生论”以及“国际共生论”提出之后，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将国际共生理论应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其中较为知名的有金应忠、任晓和苏长和等。

金应忠指出，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世界的多样化是共生型国际体系存在的前提。实现国际共生，归根到底就是要使国际行为体的主体性和共生性实现统一。各个国际行为体要在维护共生性的基础上寻求主体性的发展。国际行为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必须容忍的利益临界点，这就是国际共生底线。各个国际行为体要遵守这一底线，互相包容，保持忍让与克制，照顾彼此的利益与关切。<sup>③</sup>

关于如何构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路径，苏长和指出，要建立共生型国际体系，需要人类改造现有的文明观和世界观。中国要倡导多样文明和谐共处，摒弃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文明观与“主客”二分思维。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费孝通原则来处理多元文明间的关系。人类需要从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的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构建一个互相

---

<sup>①</sup> 参见胡守钧：《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sup>②</sup>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2期，第35-42页。

<sup>③</sup>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21页。

尊重、互相欣赏和互利共生的文明对话平台。<sup>①</sup>

任晓在其《以共生思考世界秩序》一文中指出：共生的要义在于不同事物之间要保持互主体性，互不否定，在共生共存中相互促进，这样才能促使事物取得发展。要使事物不断获得生机，不断取得发展，就要保持多样性和多元共存的状态。共生秩序就是要使异质事物“各美其美，各安其分”，和谐共长。在共生秩序下，各个主体要摒弃主客二分思维和自我中心主义，尊重、欣赏和包容异己者。国家之间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在良性交往中实现共同发展。<sup>②</sup>

从生物学领域的共生概念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共生理论，从作为哲学思想的共生再到国际共生论，这表明人类对共生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也表明人类逐渐认识到共生理念的潜在力量，想用这一理念来解决自己面临的困境。当今的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多问题，既有气候变化、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有军备竞赛、战乱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人们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得摒弃旧思维，践行共生思想，重塑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整体性的共生关系。

## 二、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国际体系呼唤新型大国关系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利益高度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在这种格局下，冲突对抗的成本极其高昂，世界各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发展，任何国家的权力实现都离不开其他国家协调与合作。各国只有和平合作才能共赢。全球化也在改变着国际政治，使其走向全球政治。在全球化推动下，大国正在发生“脱域化”转型，日益从领土国家变为全球化国家。国家的某些权力与功能将向全球范围内扩散，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部门或者全球相关部门以契约方式进行组合，构建起功能性的网

---

<sup>①</sup> 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13-14页。

<sup>②</sup> 任晓：《以共生思考世界秩序》，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1期，第21页。

络国家。<sup>①</sup> 在这种全球共生网络中，每一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受到他国的制约，使得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性增强，对抗与冲突性减弱。

全球化还会带来严峻的全球性问题。由于各国的利益博弈，这些问题的治理相当复杂。在全球性问题的威胁面前，世界各国处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国家之间命运攸关造就一种利益的相互捆绑，甚至有时看似一国的问题实质暗含着全球危机的前奏，隔岸观火的最终结果只会惹火上身，这也不得不迫使大国加强国际合作。”<sup>②</sup> 在这种情势下，各国处理国际事务就不能单打独斗、以邻为壑，而应秉持共生理念，共商、共治。只有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才能更好地进行全球治理，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

由于全球化、多极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以结盟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虽然仍保持着历史惯性，但已渐失合理性。过去，国家靠战争手段确实有胜者“通吃”或者“多吃”的可能性，但是在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利益交融的今天，战争只会两败俱伤，无利可图。如 2003 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虽然军事上获胜，但由于合法性不足而被拖入战争泥潭近 8 年之久。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国家可以通过非和平方式获取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市场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但是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与信息经济时代，其经济增长动力是内生的。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日益形成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国际体系的共生性日益增强。同时全球化导致的深度相互依存给世界各国带来诸多利好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面临着空前的脆弱性和各种极端的可能性。大国之间和则世界共荣，若大国之间转入非和平相处状态，由于风险连带，其损失惨重将无法想象。这使得国家之间不得不共生。“共生关系对任何国家都具有行为的规范性、价值的导向性以及为制度建构提供创意的引领性”。<sup>③</sup> 在这种情势下，大国必须践行共生规范，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一个国家仍以“冷战”思维与霸权理论

---

<sup>①</sup> 孙哲：《中美外交：管控分歧与合作发展》，时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8 页。

<sup>②</sup> 袁伟华：《权力转移、新型大国关系与战略机遇期》，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46 页。

<sup>③</sup> 金应忠：《为什么要倡导共生型国际体系——与熊李力先生对共生性学说理论批判的商榷》，第 10 页。

来处理当今国际关系，从长远看，必将损人损己。

###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个大国在诸多领域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有利因素。它抑制着中美关系向负面发展。同时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也不容忽视。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双方在国际体系内的竞争加剧。“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阴影在美国仍挥之不去，美国的一些社会势力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充满敌意和警惕。换言之，中美在政治安全领域仍处于非共生状态，仍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传统大国关系之间的零和博弈。

####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有利条件：中美关系的共生性

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使中美两国之间呈现利益交融的局面。同时，中美两国必须合作应对大量国际性和全球性问题。由此，两国近乎处于一个“利益和利害共同体”之中。此外，两国主体条件存在相似性，相互征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使两国关系具有较强的共生性。

第一，中美之间在经济、金融、贸易领域紧密关联、相互依赖，已日益形成紧密的共生关系。当前，中美在经济上已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双向投资保持增长。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5 583.9亿美元；截至2015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6万个，实际投入774.7亿美元。中国在美国投资保持良好增势。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466亿美元；<sup>①</sup>截至2016年9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1.16万亿美元。<sup>②</sup>巨大的贸易额和巨量国债使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核威慑的“经济恐怖平衡”。中美两大经济体的互补性很强。中美两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处于国际产业链的

---

<sup>①</sup> 《商务部：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中国日报网，2016年1月29日，[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6-01/29/content\\_23307559.htm](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6-01/29/content_23307559.htm)。

<sup>②</sup>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降至4年来最低仍是最大债主》，新浪网，2016年11月7日，<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indu/2016-11-17/doc-ifxwsix3927044.shtml>。

不同位置，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合理梯度”。中国经济越发达，中国市场就越有能力消费美国产品。美国经济优势是产业资本雄厚，金融市场和服务业发达，高端人才优势和科技创新能力强。中国的经济优势主要表现在消费市场巨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一定竞争力（尽管目前开始出现一定变化）。这种差异使得中美两国形成了事实上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这是以往很多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在利益一致性上所不具备的。

第二，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多边层面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目前世界各国面临着诸多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所具有的跨国性与关联性对各国的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这些问题的治理并非一国力所能及。中美作为世界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和推动全球治理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具有广泛共同利益。没有中美两国的参与与合作，任何全球性问题都难以有效解决。迄今为止，中美在全球安全、经济和金融、气候以及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积极参与G20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并以自己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中美两国签署了《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中美两国是世界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排放量合计占世界总量的40%。双方携手合作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标志着一个涵盖中美两国的、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在形成。

第三，中美关系历经40多年发展，具有丰富的交往经验和较深的交往基础。目前，两国已经建立了上百个多层次、全方位和宽领域的沟通机制。包括首脑会晤机制、高层会晤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等，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会晤促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减少战略误判。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民间交往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9月，中国有31个省区市同美国50个州建立了43对友好省州、200对友好城市。<sup>①</sup>2015年中美人员往来人次475万，大陆赴美旅游人次300万，赴美中国留学生31万。<sup>②</sup>这种密切的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良性发

---

<sup>①</sup> 《习近平在中美省州长论坛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9/23/c\\_1116653149.htm](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9/23/c_1116653149.htm)。

<sup>②</sup> 《祖国就在身边——记中国驻外使领馆领保工作》，中国政府网，2016年5月29日，



展的民意基础。“中美两国政府要努力将两国社会编织在一起，令公众重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意义，为这一努力提供国内基础。”<sup>①</sup>只要中美之间“民相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具备了稳固的基础。

第四，国家行为体的类型和特征也会影响其互动形态。从主体性条件上看，中美两国都是洲际大国，广阔的纵深使双方都难以征服对方。因此，与历史上战乱频仍的欧洲一些国家不同，中美两国不会轻易发动全面战争。此外，中美两国都是“文明型”国家行为体，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两者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文明型国家”具有较好的包容性和复杂的治理结构，因而能够更好地包容异质文化，妥善处理差异和分歧。因此，中美两国有可能更成熟和包容地处理双边矛盾，避免走向冲突对抗。<sup>②</sup>从消极的意义上讲，中美两国作为核大国，彼此都具有骇人的威慑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美之间发生全面激烈对抗的可能性。以上因素使得中美两国不得不共生，哪怕是一种消极的共生。

## （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制约因素：中美关系的对抗性

中美关系还有冲突的一面，比起双方合作的相对性和权益性，冲突更具有绝对性和长期性。<sup>③</sup>美国全球谋霸的对外政策，加上中美两国意识形态迥异、崛起国与霸权国身份的对立，使两国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矛盾，在政治安全领域处于非共生状态。

第一，美国全球谋霸的对外政策使中美关系存在矛盾与冲突。维护全球霸权地位是美国对外政策不变的宗旨。其霸权政策的重心就是要防范地区大国的崛起，它不能容忍一个崛起的大国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和挑战。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这一潜力的国家，与美国有着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矛盾。当前，美国在亚洲仍维持以其为中心的辐辏式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遏制与围堵中国，防止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是其重要目的。在中国快速崛起为世界第二

---

[http://www.gov.cn/xinwen/2016-05/29/content\\_5077840.htm](http://www.gov.cn/xinwen/2016-05/29/content_5077840.htm)。

<sup>①</sup> 刁大明：《美国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第97页。

<sup>②</sup> 王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10期，第70-71页。

<sup>③</sup> 庞中英：《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页。

大经济体之后，相对衰落的美国日益呈现出“霸权焦虑”，进而持续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2012年以后美国开始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计划把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试图搅动地区局势。这恶化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并给中国制造了极大的战略压力。同时，美国大力强化美日、美韩同盟，不断提高与其盟国和伙伴关系国的双边军事合作，不断支持日本逐渐摆脱战后体制的约束，充当其制衡中国的“马前卒”。美国把它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国用作遏制中国的工具，而其中的一些国家也想利用美国抗衡中国，由此双方形成了一种利益捆绑与风险连带关系。这就使中美关系易于受“第三方因素”影响而风险加大。

第二，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都存在重大差异。差异本身不是问题，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状况自主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美国却是一个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极度不宽容的国家。它有着强烈的“民主原教旨主义”，欲用美式民主“一统天下”，一些社会势力对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自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从未停止，美国一直试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达到其政治目的。尽管中美关系有逐步改善的一面，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隔阂仍未化解。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一个巨大障碍。其实在相互依存、利益交织的全球化时代，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维早已过时。但由于观念与思维的惯性加上美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强势地位，这种观念与思维仍然大行其道。

此外，中美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还会与双方在国际体系内的结构性矛盾互相叠加，使得双方的矛盾更为复杂化与根深蒂固。国家之间除了客观的实力对比关系之外，还存在身份认同、威胁感知及敌友判断的主观认知问题。国际体系内的两个国家固然会因为实力接近而相互竞争，但双方并不一定“必有一战”。历史上也有不少大国之间维持非敌对关系的例子。而双方对彼此的身份认同、敌友界定更会影响双方关系发展。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恰恰又是两个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国家。因此，客观上的实力接近加上主观上对对方的负面身份认同，使得中美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

第三，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与警惕也随之增加。在美国战略界和政策界，有很多人始终以西方的政治现实主义思维来看待中美关系，认为“国强必霸”，中国崛起后必然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这种思维是西方的、局部的历史经验的产物。西方社会战乱频仍的历史经历使得信奉权力政治的政治现实主义在美国政治学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现实主义的一些理论学说，如权力转移理论、霸权周期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等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政界和学界，使其形成了如下政治逻辑，即崛起国和霸权国随着实力的接近最终会走向武力对决，上演“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些理论和逻辑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决定了现实主义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不变的底色，使美国遏制中国、阻挠中国崛起的战略企图短期内很难改变。

总之，中美之间尚未形成全面的、足够紧密的共生关系，双方现有的共生关系还不足以制约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足以消除美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的偏见。而且，在中美实力对比中，美国仍然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它自然想要彰显自己的主体性而不愿意与中国“共生”。

#### 四、以国际共生论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倡导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符合国际共生理念的全新政治理念和大国关系模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共生性国际体系的内在要求。“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就是共生型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sup>①</sup>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全新的国际政治实践，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难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和指导。因为这些理论源于西方的国际政治实践，是建立在一元论价值基础之上的，更多地体现了西方斗争与冲突的哲学思维。国际共生论则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价值，主张世界上多元主体间的共存共生、互补相促，崇尚“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因此，国际共生论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

---

<sup>①</sup> 夏立平：《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建设》，第38页。

国关系更具有解释力和理论指导意义，可依据国际共生论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第一，创新思维，摒弃零和/冷战思维，树立共生思维，以共生思维正确对待中美之间的差异。中美双方应以共生思维看待国际差异，求同存异，尊重和欣赏异质文化和制度。特别是美国，应摒弃其文化传统中固有的一元论思维和“传教士”心态。不以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为标准来评判别人，不用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一统天下”。万物有差异才相生、共生，多元共生，才是万物相处之道。在共生的世界秩序里，各方利益交融，相依相伴，对方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对自己形成威胁，反而可能会带动和促进自身的进步。“任何国家的‘自我实现’所能达到的程度、所能上升的高度，除了自身内部条件和努力，不仅离不开其他国家‘自我实现’的成果，而且只能在其他国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sup>①</sup>如自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就给衰退中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复苏。因此，美国应以开明的心态接纳其他国家的崛起，而不是以零和/冷战思维遏制他国的发展。

第二，增加双方的政治互信。政治互信就是要在政治上不互相猜忌，不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而把对方看成“天敌”，双方相互理解和支持对方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和立场。国际体系中的两个国家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敌人，身份建构的关键是政治互信，有政治互信才可能成为朋友（至少不是敌人）。如“一战”前的英德尽管经济联系紧密，最后还是兵戎相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不能自动促使中美之间相互尊重、友好相处。政治互信是在双方长期的交往互动中形成的，需要双方在交往中理性地感知对方的意图，明确各自的利益底线，主动释放善意，增信释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政治互信是国家交往中一个很高的境界，需要双方秉持极大耐心付出持久努力才能达到。其中的关键/前提是树立共生思维，摒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偏见，包容和欣赏异质的文化和社会制度。

第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努力加深和优化中美之间的全

---

<sup>①</sup> 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第11页。

面共生关系,增加中美两国社会的共生性和认同度,使两国在各方面相互认同、消解敌意。这需要推动中美之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全方位、各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各种交流沟通机制,使双方互相了解,加深民众之间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实现互相尊重和互相包容。当前,应当继续推进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中美共同关心的战略与经济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扩大双方经贸合作,加深双方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使更多的人从中美经济合作中获益,使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稳固的“压舱石”。还应继续推进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加大双方在人文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加深双方的理解与认同。人文交流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助推器,是增信释疑的润滑剂。<sup>①</sup>只要两国能够“民相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具备了社会基础。

第四,增强中美关系的共生性、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能仅局限于中美关系双边层面,还要着眼于多边层面,布局全球,整体谋划。要把全世界看成一个共生的整体系统,如果这一整体系统的共生性得到增强,那么系统内部个体之间的共生性也会因系统的联动性而相应增强。中美两国是与世界各国处于紧密联系之中的世界大国,也会受到世界整体环境与形势的影响。“所有大国只有在做大共生性全球体系这块蛋糕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大利益,各自优化和优化选择全球性共生关系是任何大国的最佳选择。”<sup>②</sup>因此,要拓展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共生性,以此来带动中美关系走向共生,进而促使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此,既要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周边,又要尽可能管控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使它们把与中国共生发展之所得作为最重要的考量,从而淡化双方存在的矛盾,不使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因素。此外,也要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扩大与沿线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打造互利共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要在不结盟的基础上,努力形成

---

<sup>①</sup> 刘延东:人文交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助推器,新华网,2014年7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0/c\\_1111559162.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0/c_1111559162.htm)。

<sup>②</sup> 金应忠:《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第16页。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如果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生性趋于增强，进而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那么美国用以孤立和遏制中国的资源和手段就会相应减少，阻力将会加大，结盟对抗也将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2009年以来，越南和菲律宾在美国等的挑唆下多次借东盟会议恶意炒作南海问题，但大多数东盟国家在此问题上多保持中立，不愿选边站。2016年上半年喧嚣一时的“南海仲裁”结果在世界上也响应寥寥，不了了之。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东盟国家获益颇多，双方已形成了相互依赖、共生发展的态势，东盟国家不愿意为此错过搭中国经济发展快车的良机。简而言之，只要中国不断地增强与世界各国的共生性，就能巩固崛起的根基，不断增强与美国平等对话、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力。

最后，必须看到的是，当前的国际体系还没有完全演化为共生型国际体系，传统大国关系依然有着相当强的历史惯性。不能盲目夸大国际体系中的共生因素而忽视现实世界中的矛盾冲突。中美之间还存在不少结构性矛盾以及一些有矛盾的具体议题。因此，要在双方敏感的问题领域建立健全危机管控机制，合理管控危机和冲突，避免冲突加剧，干扰中美关系的大局。美国是一个具有主体性与合群性、共生性双重属性的对立统一体。这使得美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一方面具有冲突对抗的内在冲动，另一方面，也能以其合群性、共生性融入共生体系来寻求自我的最大实现。在对华关系上，表现为既试图遏制中国，又寻求交流与合作。这就需要以两手应对：一方面，加大与美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尽力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扩大双方的共生面。另一方面，则应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斗争求共生。只有使美国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共生底线，才能使之尊重中国、避免冲突和对抗。

## 五、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个长期的过程

中美关系的共生性虽然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一蹴而就地建成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提出三年来，中美

双方对此态度冷热不均，总体上是中国始终在积极推动，而美方则显得消极被动。中美双方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大分歧集中在“相互尊重”上。中国人认为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是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前提，这与中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脉相承的。而美国人则认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较容易做到，但“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这一点却很难做到。<sup>①</sup>

对于能否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之争，究其实质还是对不同的世界秩序之争。中国主张的是国家之间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而美国则要维持以其为主导的世界霸权秩序。霸权主义自然就意味着要侵犯别国的利益。中国所主张的“核心利益”大多是美国想要插手干涉的重要对象或领域，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着力点和切入口。双方在这方面的矛盾有着典型的零和色彩。因此，美国很难做到与中国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结构中，美国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的整体实力与美国还有相当差距。国际政治是具有浓重现实主义色彩的权力政治，在这种国际政治文化中，美国把它的霸权主义政策仍看成是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它并不认为自己“应该”与别国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实践中，不尊重别国核心利益是常有之事。由此可见，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和复杂的国际体系进化过程。

新型大国关系产生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母体”中，有一个不断成长、逐渐取代传统大国关系的过程。它的建成是个应势而生、水到渠成的过程，当国际体系还没有进化到相应的程度、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关条件还没有足够成熟时，它无法取代传统大国关系、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当前的国际体系虽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生性，但这种共生性还没有强大到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方面、进而形成共生型国际体系的程度。国际体系的共生关系主要局限于经济等功能性领域，但在政治安全领域则还是以零和式的传统大国关系为主，因此当前的国际体系尚处于共生秩序和零和秩序并存的状态。

---

<sup>①</sup> 王缉思：《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载《当代世界》2014年第10期，第4页。

在国际体系的进化过程中，国家行为体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处于不断被选择的过程中，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就会被淘汰，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就会胜出。这是一个客观自然的过程。国家行为体都是能动的学习者，它们会通过主体间社会化过程理性地学习并选择适合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习惯，抛弃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习惯。社会进化范式用消极学习和积极学习来解释国家行为。消极学习就是指物质环境迫使国家不得不学习适应，积极学习是指国家传播自己习得的观念从而形成塑造国家行为的社会化力量，国家行为是由消极学习和积极学习共同塑造的。<sup>①</sup> 在国际体系中，如果破坏国际共生秩序的行为有利可图，国家行为体就会理性地选择继续这么做，如果这种行为将会使国家行为体遭受失败和损失，那么国家行为体将会逐步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这样一个观念：必须遵守国际共生秩序。这一学习过程是漫长的，是在无数次的博弈与权衡中进行的。学习的结果是国家会选择并传播自己习得的观念与行为习惯。这样一来，国际体系将逐渐进化成这样一种文化：即国际共生秩序必须遵守，冲突对抗是不合时宜的，违背这一文化就会遭受惩罚和损失。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也将是这样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美需要在长期博弈中不断重新定位，选择合适的观念与行为习惯。当美国依靠旧的观念与行为习惯仍然有利可图且屡屡得手时，要它完全践行新型大国关系还很困难。当前中国尚处于崛起之中，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要美国与中国平起平坐、互相尊重，美国还不适应、不情愿。这是因为国际体系的共生性还没有进化成一种国际体系文化，还没有形成一系列有效的约束机制，还不能给美国背离国际共生体系的行为带来必要的惩罚。在这一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中国不能做一个消极的等待者，而要做积极的“施动者”。首先要加快发展自己，不断增强与美国霸权进行博弈的能力，提高美国背离新型大国关系的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并使美国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的行为得到相应的报偿。其次，中国还要努力与其他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使新型大

---

<sup>①</sup> 唐世平：《美国军事干预主义：一个社会进化的诠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89页。



国关系逐渐演变成一种国际政治文化，使传统大国关系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从而使中美之间逐渐确立新型的大国关系模式。

总之，新型大国关系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和大国关系模式，它是符合国际共生理念的。新型大国关系之“新”，是相对于传统大国关系而言的。传统大国关系延续了上千年，人类社会已饱经对抗甚至战火的磨难。人是有理性和智慧的，不能在历史的漩涡中随波逐流，要通过自己的能动选择，去建构合理的大国关系模式。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走出大国争霸的历史窠臼，属“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这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将考验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只要中美两国能高瞻远瞩，面向未来，奉行和平与合作理念，践行共生规范，就能逐渐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

[收稿日期：2016-09-15]

[修回日期：2016-12-15]

[责任编辑：樊文光]